

帝国之梦

忽必烈全传

◎ 门岿 著

文化藝術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忽必烈全傳

◎ 门 岚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国之梦：忽必烈全传/门岿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10

ISBN 7 - 5039 - 2847 - 6

I. 帝… II. 门… III. 传记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5658 号

帝国之梦——忽必烈全传

著 者 门 倏

责任编辑 胡 晋

责任校对 李惠琴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book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875

字 数 280 千字

书 号 ISBN 7 - 5039 - 2847 - 6/I · 1290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门岿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已出版：

《中国俗文学史》

《专制变奏曲——从吕后到慈禧》

《二十六史精要辞典》（主编）

《中国历代文献精粹大典》（主编）

忽必烈对元代文化形成的重大作用

(代前言)

元朝，从建朝到灭亡不足百年，在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时间比较短暂的王朝。但是它所形成的一代文化却具有鲜明的特色，并对当时世界及后世社会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元朝的开国皇帝，就是杰出的政治家，历史上著名的铁腕君主忽必烈。

忽必烈（1215—1294）的祖父成吉思汗曾使蒙古族崛起于世界，建立了一个地跨欧亚的蒙古大帝国。他也曾想灭辽、夏，亡金、宋，完成统一华夏的千秋大业，但是天不假年，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的遗愿只能由他的儿孙们去完成。其子窝阔台，乃孙蒙哥，都曾为实现他的宏伟遗愿做了毕生的努力，最终却是由忽必烈完成了成吉思汗的心愿，在华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元帝国。

忽必烈统一中国之前，从唐末五代一直到辽夏金宋，三百多年来中国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封建政权的割据，使中华民族的兄弟关系形如仇敌，相互对立；各地区之间连年征战，既破坏了、阻止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也阻碍了各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忽必烈耳闻目睹其先辈的功业，在青少年时代即“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①。他在统一中国的进程中，注意自觉吸取各民族的先进思想、先进文化，不断修正其先辈固守蒙古文化传统的

^① 《元史》卷4，世祖忽必烈一，第57页，中华书局本1976。

做法，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原文化发展的体制，为元代文化的形成和迅速发展起了他人无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忽必烈采行汉法，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改变了蒙古传统旧制。在建立元朝的过程中，忽必烈在自己周围聚积了一批汉人儒士。他们纷纷向忽必烈进言：“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①，“陛下帝中国，当行中国事”^②，“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③。忽必烈采用这些儒士的建言，制定了元朝的国制、体制、礼制，自觉承接了中国历代的王统和道统。他即位为帝时，明确宣布：“祖述变通，正在今日”^④，“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内立都省，以总宏纲，外设总司，以平庶政”^⑤，至其建立大元帝国，更明确声称：“绍百王而纪统”，“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⑥。他接受汉人刘秉忠、郝经、张雄飞等人的建议，沿中原宋金之制，设立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中央军政和监察机构，“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典故，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⑦。元代一系列中央集权封建统治制度的建立，正是忽必烈改变其祖宗成法，大行汉法的具体体现。忽必烈采行汉法就使元代文化与中国历代文化的发展相衔接，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元代得以薪火相传，从而使元代文化成为华夏传统文化发展链条中重要的一环，具有鲜明的继往开来性。《元史》卷十七《世祖本纪》即赞颂忽必烈曰：“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其后，明清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元代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其次，忽必烈当政顺应时代所需，改变了蒙古落后的生产方式，

① 《元史》卷 157，刘秉忠传，第 3688 页，中华书局本 1976。

② 《元史》卷 160，徐世隆传，第 3769 页，中华书局本 1976。

③ 《元史》卷 158，许衡传，第 3718 页，中华书局本 1976。

④ 《元史》卷 4，世祖忽必烈一，第 64 页，中华书局本 1976。

⑤ 《元史》卷 4，世祖忽必烈一，第 65 页，中华书局本 1976。

⑥ 《元史》卷 7，世祖忽必烈四，第 138 页，中华书局本 1976。

⑦ 郝经《临川文集》卷 32《立政议疏》。

采取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并重的方针，使元朝有一段时期经济发展、人口增加、社会相当安定。蒙古族在忽必烈之前的传统生产方式是以畜牧业为主的奴隶制，蒙古铁蹄所到之处将城市化为废墟，将良田改作牧场，将人民掠为奴隶。忽必烈一改乃祖的做法，大力发展战略、手工业、商业，使其与畜牧业并重。他在伐宋时就对征战中新附之地的官员下诏说：“令农者就来，商者就途，士庶淄黄，各安已业。如或镇守官吏妄有骚扰，诣行中书省陈告”^①，又对一些汉人官员下诏说：“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之知也。尔熟知其事，宜加勉旃。”^②他在政府专门设立了劝农司，以后改为大司农司，专管农桑水利。又实行垦荒屯田之制，减免灾荒地区的租税，安定流民，清理显要权贵的田土。为发展手工业，政府设立了将作院，同时还有留守司、武备司、各级地方政府及皇族勋臣王公府院管理各自系统的手工业生产。另外还有覆实司专管检验手工业产品的质量和原料使用情况。为了发展商业，忽必烈多次发行纸币、整顿钞法、减免商税、明令政府部门要保护商贾人身和其资产的安全。设立了市舶司，盐运司，茶、酒等贸易及专卖机构。忽必烈对官员的考核就以户口增、田野辟、司法简、盗贼息、赋役平为准。五事备者为上选，三事成者为中选，五事不俱者黜^③。这一系列方针和政策的实施就使得元朝经济迅速发展、城市获得繁荣、人口大幅增加、社会相对安定，从而使元代文化在诸多领域皆具有鲜明的创造性。

为适应经济的发展，在忽必烈时代元代大司农司即编成《农桑辑要》颁行全国，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而后王桢的《农书》和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问世对元代农业发展的成就做了真实的记录。其时砘车、耧车、麦笼等等农业生产工具的发明以及棉、麻、毛、丝织造业，制茶、酿酒、晒盐、窑瓷业，印刷、造船、兵器、建筑等行业

^① 《元史》卷8，世祖忽必烈五，第161页，中华书局本1976。

^② 《元史》卷8，世祖忽必烈五，第166页，中华书局本1976。

^③ 《元典章》，圣政卷一，饬官吏。

技术、工具及产品的创新，诸如木棉的栽植及搅车、弹弓、卷筵、纺车等赶、弹、卷、纺工具和印染技术，大尾寒羊的物种培育，茶磨的研制，烧酒的诞生，木刻活字的问世，回回炮、折叠弩等等皆系前世所未闻者。而元代的文学艺术、天文历法、水利工程、航运交通、医学药学等领域的创造发明更为世人共知，津津乐道。这些都是元代文化所取得的创造性成就。

再者，忽必烈平定叛乱，抵制分裂，创立了元朝宏伟的版图，并保卫了它的完整与统一，使元朝成为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帝国。忽必烈所建立的元朝“起溯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①。然而一些蒙古宗王和贵族大臣对忽必烈实行汉法治国却极为不满。他们质问忽必烈：“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②阿里不哥、海都、昔里吉、乃颜等接二连三发动叛乱，企图削弱和分裂元朝，甚至要推翻元朝。忽必烈组织兵力坚决打击这些叛乱，并且不顾高龄亲自带兵出征，一次次粉碎了叛乱者的阴谋，保卫了元朝的一统江山。从而使元代文化具有空前的统一性和领先性。

统一的国度，统一的政治，统一的经济形成统一的文化。至元二十三年（公元 1286）集贤大学士扎马刺丁言于忽必烈：“方今尺地一民，尽入版籍，宜为书以明一统”。五年后《大元一统志》编成^③，为中国古代最大一部舆地书。“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至，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④，这就使元代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领先世界

^① 《元史》卷 58，地理志一，第 1345 页，中华书局本 1976。

^② 《元史》卷 125，高智耀传，第 3073 页，中华书局本 1976。

^③ 许有壬《至正集》卷 35，《大一统志序》。

^④ 《元史》卷 63，地理志六，第 1563 页，中华书局本 1976。

的天文大观测，制定出古代最卓越的历法《授时历》；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黄河源的大勘察以及治理黄河水患的巨大工程；进行了沟通南北的大运河的修凿，使大都至杭州南北通航；同时又开辟了近海运输航线，“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①，这是中国海运史上划时代的创举。在大统一的国度，域内少数民族边远地区则迅速吸取中原先进文化的优长，如《元史》卷 125《赛典赤传》即记云南俗无礼仪，男女往往自相配偶，亲死则火之，不为丧祭。无粳稻桑麻，子弟不知读书。赛典赤教之拜跪礼节，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椁奠祭；教民播种，为坡地以备水旱，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经史，授学田，由是那里文风转兴。不仅云南，其他边区如土蕃、海南、西域等地与中原文化都得到空前的沟通，中原先进文化在统一的社会条件下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元代在当时世界也成为文化最发达的国家。

第四，忽必烈多教并重，听凭信仰自由，在一定限度内允许人们对朝政进行批评，造就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文化思想环境和比较开明的政治环境。早在 1252 年忽必烈还未当政时，元好问与张德辉一起到和林觐见忽必烈，请他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即“悦而受之”^②。以后他就成为汉人儒士的“保护者”，他尊崇儒学，礼敬孔孟，任用儒士，兴办学校；他不仅自己广泛学习儒家经典，经常与儒士讨论修身治国之道，而且令蒙古贵族子弟、大臣、后妃一道学习儒学。一代名儒姚枢、窦默、许衡等皆被忽必烈所敬重，并在他的政权中担当了重要的职务。传统的儒家学说以及宋朝兴起的理学在元代得到继承和发展。

其实忽必烈本人是蒙古族传统的萨满教的忠实信徒，元朝的宫廷以及蒙古族人崇拜天神，保持着自己民族独特的信仰。但是忽必烈并不反对其他民族和本民族人的信仰自由。他本人在接受“儒教大宗师”的称谓之后，又尊奉西藏喇嘛八思巴为国师，他和他的妃子、儿子都

^① 《永乐大典》卷 15950《经世大典》，引自《二十六史精要辞典》第 2439 页，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3 年版。

^② 《元史》卷 163，张德辉传，第 3825 页，中华书局本 1976。

从八思巴接受佛教。^①他曾命其宠臣廉希宪受佛戒，廉答已受孔子戒，他即不再勉强^②。忽必烈在尊崇佛教的同时对道教各派也加以优容，分别赐予正一、真大、太一各派领袖印信、教职、冠服，命给他们各建宫观^③。就是全真教虽然受到佛教的严重攻击，在双方辩论中失败，忽必烈也没有下令取缔。全真教的领袖人物和元朝一些达官贵人，如丞相安童等仍有紧密的联系^④。忽必烈对于其他各教派像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等皆兼容并奉。他道：“人类各阶级敬仰和崇拜四个大先知。基督教徒，把耶稣作为他们的神；撒拉逊人，把穆罕默德看成他们的神；犹太人，把摩西当成他们的神；而佛教徒，则把释迦牟尼当作他们的偶像中最为杰出的神来崇拜。我对四大先知都表示敬仰，恳求他们中间真正在天上的一个尊者给我帮助。”^⑤其宗族子弟信仰伊斯兰教、基督教者他皆听凭自由，不加过多的干预。

忽必烈当政后，虽然实行的是强权专治，但是他心目中依历代明君如唐太宗等为榜样，希望他的臣子犹如魏征那样能够犯颜直谏，对朝政大胆批评。他曾一再宣示臣下说：“朕欲求如唐魏征者，有其人乎？”^⑥，“卿等既为台官，职在直言，朕为汝君，苟所行未善，亦当极谏”^⑦。当他未能听从谏言而产生过失时，他又能向臣下认错，这在君王尤难能可贵。如不忽木曾谏言忽必烈不可任用奸臣卢世荣、桑哥，忽必烈皆未听，至卢、桑奸情败露被诛，忽必烈则对不忽木说：“朕殊愧卿”，“朕过听桑哥，致天下不安，今虽悔之，已无及矣”^⑧。元代不

① 《元史》卷 126，廉希宪传，第 3092 页，中华书局本 1976。

② 《元史》卷 202，释老传，第 4526—4530 页，中华书局本 1976。

③ 《元史》卷 202，释老传，第 4526 页，中华书局本。

④ 《马可波罗游记》卷 2，第六章，第 87 页，陈开俊等译，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1 年版。

⑤ 《元史》卷 158，窦默传，第 3731 页，中华书局本 1976。《元史》卷 160，李治传，第 3759 页，中华书局本 1976。

⑥ 《元史》卷 163，张雄飞传，第 3820 页，中华书局本 1976。

⑦ 《元史》卷 130，不忽木传，第 3167—3168 页，中华书局本 1976。

曾有大规模的焚书坑儒，也不曾有严重的文字狱，这就使元代文化具有鲜明的多元性，各个教派、各种思想皆有著述。全真教最早刊成了《玄都宝藏》，继而有《佛祖历代通载》、《敕修百丈清规》佛家教典问世，记录当时佛教的发展及其与道教之间的斗争。元代理学则一反宋代理学的空谈性命而转向务实与治生，成为明清理学思想的滥觞。而三教外人邓牧与无神论者谢应芳则跳出儒释道教派之外，标新立异大反传统之论。就是文学艺术以致医学也都流派纷呈，出现了各具特色各树一帜的大家，如元诗四大家、元画四大家以及金元医学四大家。

第五，忽必烈尊重各民族的习俗和传统，缔造了一个多民族共存的社会大家庭。在元朝各民族的文化相互碰撞、交融、组合，使元代文化具有强烈的丰富多彩性。在元代辽阔的国土上生活着汉、蒙、回、藏、女真、契丹、南诏、畏兀尔等数十个民族，各民族皆有自己的习俗和传统。对此，忽必烈基本上采取的是放任自由的态度。他没有强令各民族必须改从蒙古民族的习俗和传统，没有强令各民族必须依从蒙古族的信仰，衣蒙古族的服装，留蒙古族的发式，过蒙古族的节日，遵蒙古族的礼仪。虽然有时忽必烈也曾颁布一些禁令，干预一些民族的习俗，如《史集》所记一度禁止伊斯兰教教徒按他们的习俗以断喉法宰羊，而要他们按蒙古人的习俗剖胸宰杀，否则就将违令者处死^①。但不久就取消了这一禁令。总之，在元代各族人民在一个统一的国度里基本上是各自依照自己的传统习俗而生活，广泛自由地进行着各种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就打破了各民族单一的传统的文化样式，而呈现出一种崭新的复合式的丰富多彩的面貌。

例如：蒙族、汉族以及西北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的音乐舞蹈和伴奏乐器。元人陶宗仪即言：“达达乐器，如箒、秦琵琶、胡琴、浑不似之类，所弹之曲，与汉人曲调不同”^②，并列举出蒙古大曲与小

^① 拉施特主编《史集》卷2，第346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② 陶宗仪《辍耕录》卷28，第349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曲以及回回曲的名称多种。当时人们把这种少数民族的乐舞称为“胡乐”、“胡舞”，以与汉族的乐舞相区别。但在多民族杂居相处的情况下，胡乐、胡舞与汉乐、汉舞自然而然相互交融，这就促使了一代新乐舞——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的诞生。元散曲与元杂剧的勃然兴起为中国文化艺术又树起一座丰碑，这是中国文学和戏剧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明王世贞曾言：“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①。不仅散曲、杂剧在元代是多民族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其他如建筑、工艺、绘画、雕塑、文字、历法在元代所出现的种种新成就无不是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也正因如此才使元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大放异彩。

第六，忽必烈奉行强硬外交，积极沟通元朝与域外的交往，联络世界文明，宣扬元朝文明。忽必烈是一个胸怀远大的铁腕君主，他自幼秉承乃祖成吉思汗的教诲，目睹窝阔台汗的治政，极力想继承前辈的事业，建立更大的功业。因此他并不满足占有中原华夏之地，他要不断开拓疆土，积极开展同域外各国的交往。他发动了对日本、对东南亚诸国的征战；他对西北藩国恩威并施，严厉镇压一切叛乱；他向他所知道的各国派出使者进行联络，建立来往关系，由此就奠定了元朝对外联络极其频繁、极其活跃的交通关系，使元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发展的极盛时代。中国的印刷术、火药、罗盘等重大发明都是在这一时期传到了域外以致西欧各国，中国的天文历法、中医中药、纸币钞法、驿站牌符、建筑艺术以及军事器械和喇嘛教也在这一时代传入中亚；而域外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如欧洲的数学和西城波斯、阿拉伯等地的天文历法、回回医学、回回炮、纺织品、食品以及宝石珍玩，尼泊尔的范金术和建筑艺术也都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使元朝

^① 王世贞《曲藻序》，《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第25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的文化比以往各朝代都显得更加辉煌多姿。使元朝文化具有空前的开放性。元朝吸收了世界的文化成果，同时也为推进世界文化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环境宽松、习尚自由、国门大敞就使元代文化大厦得以高高地耸立于当时世界，显现出它特有的灿烂光辉。遗憾的是，忽必烈鼓励强征暴敛，姑息奸臣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人倒行逆施，只顾眼前之利，不顾国家长久之计。结果使人心离散，当人们不堪忍受其重负时，就只有铤而走险，进行反抗。他又奉行民族歧视政策，将国内民族分成四等，给蒙古人和色目人以种种特权，却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这种民族的不平等必然要招致民族的对抗，使元朝的统治犹如建立在时时要爆发的火山之上。忽必烈热衷穷兵黩武，连年征战，征日本、征安南一次次遭到惨重的失败，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使国库空虚，国力大衰。偏偏忽必烈以后的元朝君王一个比一个好大喜功，一个比一个穷奢极欲，一个比一个心地狭窄，他们变本加厉地推行种族主义统治，一再激化社会种种矛盾，终于使天怒人怨，激起人们一次比一次更大规模的反抗。强盛一时的大元帝国不足百年就灭亡了。

但是元朝毕竟有过它的辉煌，元朝的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曾开放出灿烂的奇葩。虽然它时间短暂，却弥足珍贵。元朝文化对中国和世界文化发展的影响不可低估。

忽必烈一手缔造了元帝国，在元代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无疑，应当给予中肯的评价，对忽必烈其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大汉族主义的思想作祟，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作怪，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局限，使得一些人对忽必烈其人其事不能正确认识，不能正确评价。他们只片面强调岳飞、文天祥是民族英雄，而忘记了女真人、蒙古人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忘记了金元也是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王朝。他们只津津乐道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却忽略了，无论从什么方面相比，都并

不比这些人逊色的忽必烈。近年来人们的思想有了改变，对元代文化，对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评价有了正确的认识。学者们也写出了种种介绍性的研究文字，作家们也写出了一些演义性的小说和其他文艺作品，但是笔者以为对忽必烈的研究和评介仍嫌不足。正是忽必烈命令修建了大都城，定都于大都城。大都的建成，不仅包容了以前的金代建筑，而且奠定了这座城市的国都地位。可以说没有大都，就很难有后来的北京。忽必烈能给大都定位，恰恰是给他自己定下了一个铁腕君主的形象，这期间就演绎出许许多多令人惊心动魄的事件。这当中也有许多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当代人借鉴，故而笔者作此《帝国之梦——忽必烈传》一书。在此书写作过程中，曾对前贤和时人的一些论作有所参考，并得到不少朋友的帮助和支持，在此笔者一并表示衷心感谢。至于书中若有缺欠，观点如有谬误，笔者也诚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教。

主要人物

忽必烈（1215—1294），元朝开国皇帝，即元世祖。

成吉思汗（1162—1227），忽必烈之祖父，名铁木真，蒙古汗国开国皇帝，元朝尊为太祖。

术赤（？—1227？），忽必烈之伯父，成吉思汗之嫡长子。钦察汗国的奠基者。

察合台（？—1242），忽必烈之伯父，成吉思汗之嫡次子。察合台汗国的建立者。

窝阔台（1186—1241），忽必烈之伯父，成吉思汗的嫡三子，继成吉思汗为第二代蒙古大汗。元朝尊为太宗。

脱列哥那（？—1246），即乃马真氏，窝阔台的六皇后，在窝阔台去世后，贵由继位前，曾监理蒙古国政。

拖雷（1193—1232），忽必烈之父，成吉思汗之嫡四子。成吉思汗去世后，窝阔台继位前，曾监理蒙古汗国。元朝尊为睿宗。

唆鲁和帖尼（？—1253），拖雷之正妻，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之母。

察必（？—1281），忽必烈之正妻，真金、那木罕之母。

贵由（1206—1248），窝阔台之嫡长子，继窝阔台汗位，为蒙古国第三代大汗。元朝尊为定宗。

蒙哥（1209—1259），脱雷之嫡长子，忽必烈之兄。继贵由之后为蒙古国第四代大汗。元朝尊为宪宗。

拔都（1208—1255），术赤之次子，钦察汗国的建立者。

旭烈兀（1217—1265），蒙哥与忽必烈之亲弟，伊利汗国的建立者。

阿里不哥（？—1266），蒙哥、忽必烈、旭烈兀之亲弟，曾称大汗与忽必烈争位。

真金（1243—1286），忽必烈的第二子，被忽必烈立为太子。后被尊为裕宗。

那木罕（？—1292），真金之弟，忽必烈的第四子。

阔阔真（？—1300），真金之正妻。铁穆耳之母。

甘麻刺（1263—1302），真金之子，铁穆耳之兄，被尊为显宗。

铁穆耳（1265—1307），真金之子，真金死后，忽必烈立他为太子，继忽必烈帝位，即元成宗。

海都（1235？—1301），窝阔台之孙，其父为窝阔台第五子合失。海都系窝阔台汗国的建立者，他始终与忽必烈为敌，不断侵扰元朝西北边疆。

昔里吉（？—？），蒙哥之子，曾与海都联合发动叛乱并企图自立为汗，后失败远窜，不知所终。

乃颜（？—1287），成吉思汗之五弟别里古台之曾孙，与海都联合侵扰元朝边疆，失败，被诛杀。

兀良合台（1200—1271），与其父速不台俱为蒙元时著名将领。

阿术（1227—1280），兀良合台子，元代著名将领。

伯颜（1236—1295），忽必烈的甥婿，元朝著名将领、勋臣。

土土哈（1237—1297），忽必烈时的名将。

八思巴（1239—1280），元代著名佛教领袖、语言学家。忽必烈时为帝师。

玉昔帖木儿（1242—1295），忽必烈时的名臣。成吉思汗时的名将博尔术之孙，辅佐成宗继位有功。

阿鲁浑萨里（1245—1307），畏吾儿人，事真金，为忽必烈宿卫，官集贤学士，拥戴铁穆耳有功。

安童（1248—1293），忽必烈之甥。成吉思汗时名将木华黎之孙。元代名臣，任中书右丞相。

完泽（1246—1303），忽必烈当政初期右丞相线真之子，在忽必烈后期与铁穆耳时期任中书右丞相。著名大臣。

不忽木（1255—1300），康里人，元代名臣，曾任平章政事。

彻理（1259—1305），忽必烈的宿卫，元成宗时官中书平章。

阿合马（？—1282），西域人，忽必烈时的权臣、奸佞，被王著等人杀死。

卢世荣（？—1285），名懋，忽必烈时一度执掌中书大权，被人弹劾处死。

桑哥（？—1291），畏吾儿人，忽必烈时的权臣，被人弹劾后处死。

李璮（？—1262），山东地区的军阀，归附蒙古汗国后复叛，被诛杀。

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成吉思汗与窝阔台时期的名臣、政治家。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金朝进士。金亡不仕。文史学家。

王文统（1190？—1262），字以道，忽必烈继位后首任平章政事。因交通李璮谋反被诛。

张柔（1190—1268），字德刚，蒙古汗国的著名将领，元朝的开国勋臣。

王鹗（1190—1273），字百一，金正大元年状元，归于忽必烈，为著名谋臣。

李治（1192—1279），字仁卿，金进士。翰林学士。又作李冶。

张德辉（1195—1274），字耀卿，翰林学士，中书参议，官至侍御史。

窦默（1196—1280），字汉卿，元代著名学者。皇子真金的首任教师。

姚枢（1201—1278），子公茂，元代著名学者，开国大臣。